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历史著作史

下 卷

第 三 分 册

〔美〕J.W. 汤普森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著作史

下 卷

第 四 分 册

〔美〕J. W. 汤普森 著



98257

K091
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著作史

下卷

十八及十九世纪

第三分册

[美] J.W.汤普森 著

孙秉莹 谢德风 译 李活校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K091
5

98238

200413150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著作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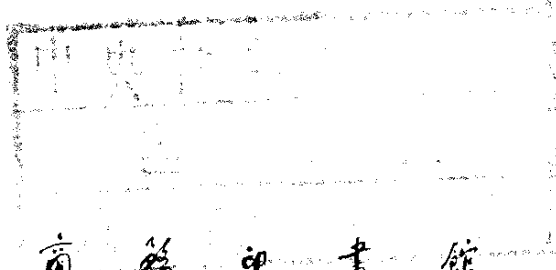
下卷

十八及十九世纪

第四分册

[美] J.W.汤普森 著

孙秉莹 谢德风 译 李活 校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著作史

下 卷

(下卷全两册)

〔美〕J.W.汤普森 著

孙秉莹 谢德风 译 李 活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206-1/K·494

1992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703 千

印数 7 000 册

印张 29 1/4 插页 8

(60克纸本) 定价: 34.2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2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3月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II,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By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2

根据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42 年第一版译出

目 录

第六编 近代史学的兴起

第三十七章	博学时代(约 1600—1750 年)	1
第三十八章	理性时代	78
第三十九章	德国和启蒙时代	130
第四十章	浪漫主义的出现	179

第七编 近代德国史学的建立

第四十一章	柏林大学: 尼布尔和兰克	201
第四十二章	兰克学派	255
第四十三章	普鲁士学派	280

第八编 19 世纪法国和英国史家

第四十四章	法国史家(1814—1848 年)	307
第四十五章	法国史家(1848—1922 年)	359
第四十六章	19 世纪初叶的英国史家	380
第四十七章	麦考莱、喀莱尔、夫鲁德	401
第四十八章	牛津和剑桥历史学派	423
第四十九章	英国伟大的业余史家	459
第五十章	研究英国史的德国史家	477

第九编 论述各种制度的史家

第五十一章	法国 19 世纪的制度史家	493
-------	---------------------	-----

第五十二章	英国 19 世纪的制度史家	525
第五十三章	制度史家：城市起源问题	546
第五十四章	经济和社会史家	563
第五十五章	实证学派史家：19 世纪的自然科学对历史写作的影 响	601

第十编 古代东方、古典时代和拜占庭研究

第五十六章	恢复古代东方的本来面目	631
第五十七章	研究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近代史家	667
第五十八章	拜占庭研究的进展	700

第十一编 19 世纪的教会史家

第五十九章	天主教史家	728
第六十章	新教史家	762
第六十一章	《圣经》和犹太史	785

第十二编 欧洲诸小国

第六十二章	北欧诸国	809
第六十三章	南欧诸国	826
第六十四章	东欧和巴尔干诸国	849
索引	884

第六编 近代史学的兴起

第三十七章 博学时代

(约 1600—1750 年)^①

近代史学开始于宗教改革和反改革。路德派和喀尔文派同样³攻击罗马教会的历史根据和历史论断。罗梭索·发拉对于伪造“康斯坦丁圣赐”之事^②的否定做法，也可以用来对待具有教会权威的许多其他传统和文献。历史批判已变成新教手中的武器，而众多文献也被《马格德堡世纪丛书》^③诸编者用作投枪。罗马教会对新教以历史为武器的斗争迟迟未能警觉，竭力把争论限制在神学问题范围以内，但这只是徒劳。以历史为手段的攻击终于变得十分有效，以致罗马不得不以历史还击历史。既然宗教改革是以历史为武器进行的斗争，所以反宗教改革也不得不利用同样手段，从而对史学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④ 罗马教廷把反击《马格

① 关于史学上这个重要时期，以任何语言写的著作中都没有全面记载。探讨这个时期写的东西，几乎全是专论或期刊性质的。佛特的书第 381—410 页有最好的简要说明，附有出色的书目提要，还可参阅他的导言第 iii—vii 页；这类说明还见于奥古斯特·摩林尼尔的《从原始时期至 1494 年意大利战争为止的法国历史资料》（巴黎，1901—06 年，六卷），第 5 卷，第 159—170 页；在英文著作中可参看 G·N·克拉克的《17 世纪》（牛津，1929 年）第 16 章和史密斯的著作，第 1 卷，第 6 章。在保罗·哈扎那部很好的著作《1680—1715 年欧洲道德观的危机》（巴黎，1935 年，三卷）里分析并阐明了这个新时代的学术气氛。

② 参阅上卷第 521—22 页。——译者

③ 新教徒主编的丛书，专门攻击天主教的。——译者

④ 迦伯列·摩诺的《天主教改革》[巴黎]《历史评论》CXXI(1916 年)，第 281—315 页。

德堡世纪丛书》和新教历史学派的责任委托给红衣主教巴洛尼阿斯(1538—1605),他的《教会年代记》第1卷于1588年由梵蒂冈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一年!①

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和战争,把直到那时众人一向无从看到也无法知道的成千上万的档案和其他手稿公诸于世,从而推动了,也便利了人们对历史发生新兴趣,这件事确实奇怪。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许多寺院被解散,德国的农民战争和什马尔卡登同盟战争,法国的胡格诺战争以及随之出现的许多修道院和教堂图书馆被洗劫等情况,使大量手稿和其他文献抛向市场,价格往往非常便宜。不久,学者和书籍收藏家都如梦初醒,纷纷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开始抢救这些宝物。16世纪德国新创办的那些新教大学的图书馆几乎完全都是以从这些修道院中劫得的赃物充实起来的。②来自科比和夫勒里等修道院的许多手稿都变成16世纪的得·图、匹陶、度申和其他法国学者的藏书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马撒林首批巨额藏书在福隆台暴动期间③暴徒抢劫他的官邸时散失净尽。在英国内战中许多教会图书馆和保王党贵族在乡间那些巨大宅邸中的藏书也遭抢劫。甚至牛津和剑桥也受到损失。在德国三十年战争中,考斯道夫·阿多发就象一位收割者那样,把许多图书馆的藏书捆起来一齐搂到自己手中。布拉格的书籍和手稿几乎被抢劫一空。④梯里抢夺海德堡大学那座藏书丰富的图书

① 1588年英国粉碎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天主教的支柱西班牙王国衰落下去。——译者

② 考斯道夫·波根,《书籍爱好者、收藏家及所藏史书》(莱比锡,1922年,三卷)第3卷,第113—19页。

③ 1648—53年间法国贵族反对王权的暴动。——译者

④ 参看鄂图·沃尔德的《文化史目录学研究》(乌普萨拉和斯德哥尔摩,1916—20年,两卷;R·埃沃尔德的“哥达图书馆史”,见《图书知识中央报》第18期(1910年),第434—63页;C·P·库波的《英国最重要公文记述等》(伦敦,档案委员会,1832年,两卷),第1卷,第51页。以撒·科利英的《乌普萨拉皇家大学图书馆早期书籍目录》(乌普萨拉,1907年)说明五百册书中差不多每册都是“瑞典劫掠品”的一部分。

馆的事难道不是尽人皆知的吗？

在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兴趣，新的学术条件和新型学者。在这种新的探索中，法国是开路先锋。佩耳·匹陶(1539—96)是创始人。他出身于法国著名法律家家庭，是史学家得·图的朋友，他二人共享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史学界的荣誉。他编辑并出版了萨尔维安、助祭保罗和弗赖辛主教鄂图等人的著作以及查理大帝、笃信者路易和秃头查理等帝王收藏的教会法规。他临死时正在整理普瓦捷人海拉里的历史残篇。他的朋友尼古拉·勒·非甫尔出版了这部书，并在书前附了一封献给得·图的信，信中说明了这些手稿和匹陶建议编订这部手稿的情况。匹陶关于收集并编订中世纪法国史料梦想后来由圣摩耳修道院柏尼德提派修道士实现了。^①

但有志于此的并非匹陶一人。他是和安得烈·度申(1584—1640)分享这个荣誉的。在胡格诺战争摧残下当法国许多修道院也象早些时候英国诸修道院的宝藏和书籍遭洗劫时那样，度申成了一位不知疲倦的手稿收集家。他收藏了大量手稿，据说这批手稿曾形成“从有史以来直到16世纪法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大文库”，手稿的一部分后来落入科尔伯特手中；又一部分装订成59巨册，以度申藏书的名义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度申仅仅出版了他 5 这批庞大收藏的十分之一。他计划写一部24卷对开本法国史巨著。前14卷包括从图尔人格雷戈里到15世纪末所有重要法国史家的著作。后十卷专载法国各省地方史。前一部分仅仅出版了《丕平统治时期以前的法国史家的著作》计五卷，1640年他因车祸去世后由他儿子完成。地方史部分仅仅完成了《古代诺曼史家著作》(Historiae Normannorum scriptores antiqui) (1619年，五卷)，这部书成了度申的第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历史著作。这

^① 关于他的著作的完备书目，参阅《大百科全书》第26卷，第992页。他写了大量法律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编订的《西哥德法令》。

些书出版时都未附序言和注释。作为原始范本，这些书曾经是所有研究诺曼史的学者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了一些重新校订过的诺曼编年史家的著作开始取代它们。度申受到黎塞留的知遇，被任命为王家历史官兼地理官。人们称他为法国史学鼻祖，他确实当之无愧。^①

在历史写作方法问题的讨论上，法国也领先。这方面最早的著作就是冉·波当的《史学方法指南》(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 (巴黎，1566年)。^② J·J·斯卡力泽(1540—1609)破题儿第一遭把年代学置于科学基础上，他的《年代校订》(Thesaurus temporum) (第1版，1583年)是在他审查并改编《攸栖比阿斯的编年史》(Eusebian Chronicle) 时受到启发写的。马克·帕蒂森说^③：“斯卡力泽在历史批判方面的伟大著作超过下一代任何人的鉴别力。……只有偶尔出现的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学者，……才有本领估价斯卡力泽的巨大成就。……[他是]史学批判的创始人。……耶稣会对斯卡力泽的攻击……是他平生一件重要的具有特色的事情。”和他通信联系的人遍及新教欧洲。卡姆登曾于1594年把自己编的《大英帝国》(Britannia)寄给他一本。在罗马铭文很少的英国，斯卡力泽只好把主要精力放在图书馆里，但由于其中希腊典籍也十分缺少，他很失望。但他并不是干燥如土的

6 学究。令他惊异的是，英国竟没有领主裁判制；许多边疆歌谣富有

① 安得烈·度申的主要著作是：《法国历代国王辉煌威仪的遗迹与研究》(巴黎，1609年)；《法国全境的城市、宫殿、……等古迹与研究》(巴黎，1608年，两卷)；《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史》(巴黎，1614年)；《保罗五世以前的教皇史》(巴黎，1616年)；以及《从408到1350年勃艮第国王、公爵和伯爵的生乎》(巴黎，1619—28年，四开本；1634年，两卷，对开本)。除这些以外，度申还出版了许多著名法国家族谱系，其中最好的据说是芒模伦西家族史。他的《法国红衣主教与圣徒传》已由波兰达斯派、马比昂和其他等人刊印。他还出版了朱文那尔的《讽刺诗》译本，以及阿伯拉德、阿郎·沙退和亚田·帕斯揆等人一些著作的校订本。参阅《大百科全书》第14卷，第1185—86页。

② 见本亥姆的书，第217—20页。

③ 见帕蒂森的书，第1卷，第132—34页，关于斯卡力泽，参阅第132—243页。

文学魅力；玛丽·斯图亚特的美貌；英国北方使用煤炭而不用木柴；牛津和剑桥二校研究生们竟是这样懒惰。^①

在促进这门新学问发展方面，法国的法学家和古文物爱好者也尽了自己一份力量。伟大的邱哲细阿斯的《罗马法论注》(Commentaries on Roman Law) 于1578年出版。登尼斯·哥陶弗列杜，即高得弗罗·兰欣(1549—1621)编辑了一系列大部头的法律著作或法律汇编——包括罗马法、封建法、宗教法等等——这项工作后来由他儿子雅克·高得弗罗(1580—1652)继续进行。他的巨著即《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 六卷)。他为这部书花了30年的功夫。这部巨著的成就赢得从当时直到现在一切罗马史家的赞誉。吉本、蒙森和迪尔等都曾大量使用他这部书里的材料。^②

亚田·帕斯揆(1529—1615)是法国律师界的光荣，也是这群优秀历史家当中的一位。1560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大作《法兰西研究》(Recherches de la France)，这是一系列考古和历史研究论文，其中最出色的一篇讨论的是大陪审官制度(Grands Jours)的历

① 1590年斯卡力泽迁往莱顿接替业已转变为天主教徒的力普西乌，这是16世纪学术的里程碑。参阅《约瑟·斯卡力泽自传》，G·W·罗滨孙将此书译为英文，并附有许多摘自斯卡力泽的书札，他的遗嘱，以及但以理·亥因栖乌和多密尼卡斯·鲍底阿斯的墓前致词中的引文(剑桥，马萨诸塞州，1927年：哈佛翻译丛书)。至于进一步的情况，可参阅雅各·柏尔奈斯的《约瑟·查士塔斯·斯卡力泽》(柏林，1855年)，在[伦敦]《评论季刊》第108期(1860年)第34—81页中有详细评论；参阅帕蒂森的书，第1卷，论文第6—7页，和他的《以撒·加索绷，1559—1614年》(第2版，牛津，1892年)；桑兹的书，第2卷，第199—204页；以及尤金和Em·哈格合写的《法国新教或在历史上自称法国新教徒的传记》(巴黎和日内瓦，1846—59年，十卷)，第7卷，第1—26页。

② 高得弗罗父子是胡格诺教徒。父亲从1600年到1621年任海德堡大学法律教授，1621年梯里洗劫海德堡时被赶走，丧失了自己的图书。雅克·高得弗罗生于日内瓦，并在该地度过一生，他的兄弟狄奥多尔·高得弗罗(1580—1649)放弃新教，改信天主教，定居法国。1617年被委任为王家史官，并数次以大使身分被任用。1649年在蒙斯特逝世。他是一位多产史家。关于三位高得弗罗的著作的全部目录，可参阅《大百科全书》，第18卷，第1145—47页。

史，这个制度在下一世纪就衰落了。1585年帕斯揆被任命为贴现院(Chambre des Escomptes)大律师。他曾出席1588年在布卢瓦举行的三方议会^①，吉兹公爵就是在议会里遇刺的，他在那里还曾遇到蒙田。

这就是17世纪博学时代的史学和文献学的背景。这是一个高贵的遗产。但在进行专题讨论以前，不妨停下来先看看历史写作和历史学术上那些阶段和过渡，也象在其他形式的写作中那些阶段和过渡那样，这也是值得的。17世纪的学术可以看作类似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古希腊文化后期的东西，或简称第二个古希腊后期^②。博学时代和文艺复兴之间，或博学时代和宗教改革之间的区别，比这些时代在年代上的差距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意义要大得多。这种差别是在思想结构、学术兴趣、精神状态等方面都已起了变化的质的差别。已故的J·富兰克林·詹姆森教授^③在一篇文章里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这一点：

我们看到，世界从这样一个时代获得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文和历史成果。非凡的博学家比非凡的天才多得多。当时的风气是冷静地、有条不紊地收集资料。更加受人尊重的是极其充分地介绍原文和历史文献，而不是撰写叙事史或抓住古代高谈阔论。对开本书籍比8开或12开本更受欢迎。拉丁文比本国话更为流行，马斯科《古代德国史》^④的主要评论家热情地说：这部书如此之好，却没有用拉丁文写，真令人遗憾。……对这个时代的成就只从性质上描述无法给人一个恰当的概念，因为它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在出版数量方面极其巨大。从1650至1750那一百年间，……不算其他著作，仅就满载早期教会和中世纪史原始文献的书

① 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由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组成的议会。——译者

② 参阅上卷第3章。——译者

③ 美国史学家(1859—1937)，著有《美国史词典》(1894年)及《把美国革命当作一个社会运动来考虑》(1926年)等书。——译者

④ 《法兰克王国开国以来的日耳曼史》(莱比锡，1726年)。这部书由托马斯·列第亚德译成英文，名为《古代日耳曼史》(伦敦，1737—38年，二卷)。这个译本是吉本的主要根据之一，这对他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不能阅读德文。

籍而论，据估计，只是在法国一国就出版了对开本 400 部以上。……人们如果设想其数量如此惊人的学术成就仅仅是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认为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或无视这些学识的相对价值及其较高的用途，那就错了。事实并非如此，很明显，这项搜集工作花费的极其大量的劳动有其自觉的目的。这一点，从当时历史和古典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辅助学科的得到发展及那些不朽的参考用书的编撰方面所依靠的智慧和有条不紊的技巧，可以得到明证。

在广泛研究纯古典学术方面，16 世纪的斯卡力泽、加索绷和力普西乌这样一些人的名声可说是高于本特利或格洛诺维阿斯^①。但铭文科学的提高却是法布雷提^②和穆拉托里^③的功劳。杜·孔日先生^④把晚期和中世纪希腊文和拉丁文编成百科全书式的辞典。马比昂以他那篇典范论文《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 一劳永逸地为古文书学这门科学奠定了牢固基础。其他学者使年代学和古文字学、书目学和古钱学都有了条理分明的、科学的形式。这类探讨辅助学科的论文的一些对开本或者象培尔的《词典》(Dictionary) 一类学术百科全书表明，这个时代尽管或许有些缺乏远见，但至少可以说除了搜集外，他们也部分地意识到欧洲学术的正规发展需要条理，需要科学方法，需要批判地注意和仔细地思考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

其结果是，一方面，目前学术界经常要求有编得更好一些的原文；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许多对开本巨制，由于其论题得当，也很少被近代学者认为无用。那一套套卷帙浩繁的中世纪编年史或圣徒传记、一套套国王的、教皇的、高级教士的以及寺院和宗教会议的信件和文件，那些卷帙浩繁的教会领袖的作品或各省各地区的资料，仍然是历史家取之不尽的宝藏。如果不借助于博学时代那些无畏的人们的辛勤劳动提供了这些资料的话，教会史或中世纪史里边的任何重大问题都是无法进行彻底探讨的。^⑤

① 荷兰古典学者(1611—71)，校勘李维、塔西佗等古典作品。——译者

② 本书原书第 21 页。——译者

③ 本书原书第 50—51 页。——译者

④ 本书原书第 29—31 页。——译者

⑤ 见富兰克林·詹姆森的“博学时代”，这篇文章是 1905 年 6 月 12 日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一年一度的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讲稿，载在《[芝加哥]大学学报》第 10 卷(1905 年)，第 19—28 页。我觉得引用这一段较长的文字是正确的，因为这篇好文章再也没有重印，而且事实上是无法得到的。

博学时代的历史学者那种强烈的献身精神、那种不知疲倦的下苦工夫、那种惊人的巨大的编撰本领，件件都使近代学者惊叹不已。即使考虑到下列情况：当时没有报纸、期刊、小说等分散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当时在学校里教的公共科目比现在少得多，并没有公开讲演和电话分他们的心；为了和世界学术水平保持一致，当时只需要一种语言，拉丁文，或者，如果他是一位古典学者或神学家，再加上一门希腊文就行了——即使考虑到这一切之后，仍然会令人惊异不已。而且，这种惊人的学术成就大部分都是政府毫无所知的，更接受不到政府的任何指导。学者与政治无关，受不到政治控制的影响。甚至文学、科学等领域与历史研究领域之间也几乎毫无接触。

在这个新的学术时期有一个触目的事实，即这些工作大多是共同合作的产物。出众的、不依靠他人的独力工作者也可以找到，但广泛流行的却是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这一点本身就给这个时期打上印记，因为这和以个人主义为突出特点的文艺复兴时期大不相同。

史学界这种通力合作最早的例子是由耶稣会诸学者组成的名为波兰达斯派神父协会的一个团体。^① 耶稣会在其创始时期

^① 关于波兰达斯派和《圣徒行传》的文献是很多的。参阅Ch·得·斯麦得在《天主教百科全书》第2卷第630—39页上发表的文章，附有许多书目提要；季尔第的书，第190—211页，论“波兰达斯派”，附书目提要；《比利时本国的传记》，第1卷，第630—41页论波兰达斯派的文章；希坡利特·得勒赫伊的《三个世纪以来（1615—1915年）波兰达斯派的工作》（布鲁塞尔，1921年），英译本为The Work of the Bollandists Through Three Centuries, 1615—1915（普林斯顿大学印刷厂，1922年）；同一作者的《圣徒传说》（第3版修订本，布鲁塞尔，1927年），V·M·克洛福德夫人根据第2版译成英文，即《圣徒传说，圣徒行传导言》（伦敦，纽约，1907年）；F·贝克斯的《波兰达斯主义复兴一百周年》，载在《教会历史评论》，第34期（1938年），第270—96页；得·斯麦得关于波兰达斯派创建者的论文，见〔杂文〕《论高得弗罗伊德·库尔特等》（列日，1899年）第1卷，第297页以下；“波兰达斯派圣徒传”，见《天主教界》第27期（1878年），第756—65页和第28期（1878—79年），第81—87页；奥里略·帕尔麦里“波兰达

(1540—90年)把宗教生活感情化、理想化了,从而征服了人们的心。“它几乎垄断了圣洁的美名并以善于掌握敏感的天良著称。……在纯粹宗教虔诚的基础上,它为教会赢得彻底胜利。”^①该会在其第二个时期(1590—1715年),曾竭尽全力夺取学术园地。直到17世纪,还没有人尝试把批判的原则应用于以《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著称的浩瀚的中世纪文献上。在这方面的先行者蒙布里提阿,李帕曼那斯和苏里阿斯等都是辛勤的编辑和虔诚的注释者,但他们缺乏批判精神或方法。在过去许多世纪中,圣徒行传业已搀杂传奇式的内容,并以难以置信的逸闻加以美化,甚至引起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嘲弄的愚蠢的无稽之谈也常常塞入其中。波兰达斯派的目的就在于从受人蔑视的境况中把圣徒行传拯救出来,并把它们作为大量宗教和历史文献的真正性质和价值确定下来。

这项庞大计划由耶稣会的赫伯特·路斯威德带头干了起来;他1569年生于乌特勒支,死于1629年,当时他的计划除了大纲以外并未完成多少。在他的学生时代以及后来在杜埃学院当教师的那些年,他把所有空余时间都用在低地诸国那些修道院和教堂的图书馆里浏览群书,并发现实际上久已埋没无闻的大量圣徒传记

斯派”,见《天主教历史评论》新3期(1923年),第341—67页和第517—29页;罗伯·列沙特,“波兰达斯派圣徒行传”,同上杂志,第6期(1920—21年),第334—42页;萨宾·贝灵-谷尔德《圣徒传》(新修订本,爱丁堡,1914年,十六卷,第1卷,导言;《书板》,1922年4月8日特斯頓的著作;B·奥贝,“波兰达斯派的工作”见[巴黎]《两世界评论》,第73期(1885年),第169—99页,红衣主教冉·巴普提斯特·皮特拉高僧,《波兰达斯派耶稣会教士对圣徒传记集的研究》(巴黎,1850年);查理·得约伯,《特伦特宗教会议对天主教人民文学和艺术的影响:路易十四时代文学史序言》(巴黎,1884年),第3章;恩斯特·芮农,《宗教史研究》(第7版,巴黎,1864年),第301—15页;希坡利特·得勒赫伊,《写圣徒传的方法》(布鲁塞尔,1934年);G·F·斯托克斯,“波兰达斯派”,见[伦敦]《现代评论》第43期(1883年),第69—84页;F·C·柏刻特等人:《圣芳济会论文集》,第2卷(曼彻斯特,1932年)。

① 帕蒂森的书,第1卷,第187页。

材料。他计划编写一部 18 卷对开本巨著。第 1 卷专写耶稣的生平和纪念耶稣的节日；第 2 卷专写圣母，与第 1 卷类似；第 3 卷论述诸圣徒那些隆重节日。在这为首的三卷之后，其余各卷准备写圣徒生平，每卷写年历中的一个。并拟在这 15 卷之后，另写结尾三卷作为补编，内容为批评和解说性的注释以及全书索引。这些注释准备探讨作者、偶像、宗教仪式、年代学、地志等问题，末尾附录专门术语和难解词汇表。

路斯威德神父按照人们长期以来都遵循的先例，准备按圣徒节日顺序，而不是按历史顺序排列诸圣徒的传记。结果，不管圣徒生在何时代，是 3 世纪、6 世纪或 9 世纪等等，人们在 1 月份那些节日进行纪念的所有圣徒都归入第 1 卷。这是因为，在罗马教会
10 的历书上，每日都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圣徒，每位圣徒都有他或她自己的节日。这种习惯起源于教会初期。^①显然，路斯威德并没有意识到他这项计划如何庞大。红衣主教柏拉民^②听到他这个计划时，大吃一惊说：“难道这个人准备活两百岁吗？”

路斯威德于 1629 年去世时，就把自己收集的材料和未完成的设想传给另一位耶稣会员约翰·波兰达斯(1596—1665)了。波兰达斯不是荷兰人，而是比利时人，他那长时期的辛勤劳动和学术成就使这个团体有了“波兰达斯派”这个名称。波兰达斯不久就看出这项工作十分艰巨，单凭他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他就联合了另外一些学识渊博、勤奋不倦的人和他一起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是杰弗理·亨斯琴(1600—81)和但以理·丕皮布洛奇(1628—1714)。后者把自己颇为丰富的财产贡献给这项工作，而且活了很大年纪。

^① 由于这样特殊的编排，引自《圣徒传》的引文不同于任何其他引文，首先是列举出日子，然后举出卷数和页数。

^② 柏拉民(1542—1621)，1560 年加入耶稣会，1955 年为红衣主教，主张教皇不但有权掌管精神世界，并且有掌管世俗世界之权力。——译者

波兰达斯把人们组织起来担任这项工作。资料收集得还很不充分。于是他就在整个欧洲展开工作，和各地耶稣会代表联系；写信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国、波兰、波希米亚、英国和法国，请求各地学者合作，搜索可能找到的一切存放圣徒传记手稿的地点。波兰达斯收集到的资料达到路斯威德收集的总量的四倍。

波兰达斯从前教过的学生亨斯琴于1635年开始编写《圣徒行传》。1月份的那一卷仍未完成。波兰达斯负责撰写西班牙、英国和德国圣徒传，亨斯琴担任法国、意大利、希腊教会和东方的。1643年前两卷问世。其中包括其节日在1月份的所有圣徒。1658年又出版了三卷，包括其节日在2月份的诸圣徒。这是波兰达斯去世前七年的事，他看到自己的巨大工程顺利进展颇为满意。在亨斯琴领导下完成的有1675年出版的收入4月份的三卷，1680—88年间出版的收入5月份的七卷以及6月份各卷。不过后者实际上是在1681年他去世后很久才出版的。继亨斯琴之后领导这项工作的是于1660年参加这个团体的但以理·丕皮布洛奇；就某些方面说，他是波兰达斯派神父里最伟大的一位。

写在《圣徒行传》各卷前面、特别是早期各卷前面的那些序言¹¹（称为 Propylaea）是历史方法和历史批评文献的里程碑，而且是这类文献的先驱。波兰达斯为第1卷写的序言“在历史方法发展史上应当永远占有它的地位”。^①最著名的那些序言是丕皮布洛奇写的。此外，在3月1日那一卷里有亨斯琴写的一篇波兰达斯传；5月7日那卷有丕皮布洛奇写的一篇亨斯琴传；6月6日那卷有比尼阿写的一篇丕皮布洛奇传。

但在这些序言当中有一篇使丕皮布洛奇在学术上栽了跟头，因为他过于大胆地闯入他并不擅长的古文书学领域里去了。中世

^① 参阅巴特里克·A·科里斯，“《圣徒传》序言”一文中翻译的一些摘录，此文见《天主教历史评论》，第6期（1920—21年），第294—307页，引文出自第307页。

纪许多特许状和地契可能提供的帮助曾给他深刻的印象；当他在卢森堡发现据说是达哥伯一世^① 发放的一张古代特许状而且确信它是伪造的时候，他深有感触。在研究了文件以及墨洛温王朝其他文献的基础上，丕皮布洛奇写成他的著名论文《古文书真伪辨异序》(Propylaeum Antiquarium circa veri ac falsi discrimen in vetustis membranis)，攻击了伟大的柏尼德提派圣登尼斯修道院那些极其重要的特许状的真实性。不幸的是，丕皮布洛奇对特许状不象对中世纪记事史和编年史那么熟悉。^② 各地柏尼德提会，特别是摩耳派那些修道士，得悉后大为震惊，激愤异常，因为他们认为丕皮布洛奇的著作是对他们的正直、权威和历史的诋毁，也是对他们的产权的攻击。他们委托圣泽芒·得·布莱修道院^③ 高僧^④ 马比昂撰文回击丕皮布洛奇。这位高僧机智地决定不写一般的“辩白”，而是以列出历史批判的一般准则和运用丕皮布洛奇并不熟悉的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等辅助学科，在纯粹的学术和科学讨论的水平上进行争辩。1681年，马比昂的《古文书学六卷》(De re diplomatica libri VI)出版，从而创建了古文书和古文字这两门学问，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⑤

17世纪柏尼德提派和耶稣会这些伟大历史学家之所以在这个苛刻的时代成为杰出人物，就是因为他们把对学问的彻底忠诚
12 和审慎的精确性同独立的历史批判精神和无比的熟练技巧结合了

① 法兰克国王(628—39年在位)。——译者

② 关于这个题目，可进一步参阅理查·罗森蒙的《马比昂以来古文书学的进步，特别是在德、奥二国》(慕尼黑和莱比锡，1897年)，第9—13页；亚塔尔·纪里的《古文书学手册》(巴黎，1894年)，第60—62页；F·W·哈尔的《古典经文指南》(牛津，1913年)，第110—13页。

③ 巴黎一个修道院。——译者

④ 原文为 Dom，天主教会高级修道士和圣职人员的尊称，姑以“高僧”译之。——译者

⑤ 第2版，1709年；第3版，那不勒斯出版，1789年，两卷。

起来。丕皮布洛奇读了冉·马比昂这篇著名的论文之后写给他的信,可以说是在学术上的自尊和谦逊这两个方面的典范,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文字了:

我可以坦率地向你公开承认,我以这个题目写的那篇文章得到的安慰没有别的,只是为你那篇如此杰出的论文提供了撰写的机会。的确,在初读你这部书时,我看到自己被彻底驳倒,毫无答辩余地,也感到一些痛苦;但你这篇极其难得的文章的效用和妙美很快就征服了我的弱点。而且,在看到如此清晰地阐明的真理之后,我欣喜万分,于是就把我的同伴邀来共享我内心充满的欣慰。因此,一有机会,我便毫不犹豫地公开声明,我已完全放弃了我自己的主张,完全接受你的思想了。我向你恳求友谊。我并不是有学问的人,而是很想学习的人。

丕皮布洛奇的其他经历的后果并不是这样愉快的。卡迈尔派^①修道士竟然顽固地坚持说创立他们这个教派的是先知以利亚^②这只是传说里的一个说法;而丕皮布洛奇则把正确的传说和无稽之谈区别开来。卡迈尔派在佛兰德地区的负责人瑟巴斯梯安神父写了一篇短文《错误的揭露》(Exhibitio errorum)进行争辩,激烈地攻击波兰达斯派的历史批判方法,并列举了约80条他们认为错误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战。^③这本小册子是1693年出版的。丕皮布洛奇以他的《对于揭露错误的答辩》(Responsio ad exhibitionem errorum)一书进行了回击。他这本书分两部分,先后于1696年和1697年出版,他在书中反驳这个古老的传统准则:“资料来源越古老,越普遍被人接受,也就越应该受到尊重”;他主张资料的价值如何只能看它们是否真实,是否和

① 卡迈尔派修道士1156年创设于叙利亚卡迈尔山,是托钵僧的一种,又称白袍修士。——译者

② 犹太传说中9世纪的先知,见《列王纪》。——译者

③ 阿洛易斯和奥古斯丁·得·巴克尔的《耶稣会作家文库》(卡罗·索美服格尔新校本,布鲁塞尔和巴黎,1890—1932年,11卷),第1卷,1655—64年,列出了40多篇这样的论文。

事实相符。

卡迈尔派在宗教裁判所仍很活跃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点起一把火，托莱多^①的宗教裁判所颁布训令，指责波兰达斯派、禁止阅读和出售《圣徒行传》中3、4、5月份诸卷，违者罚款并逐出教门。罗马也照此办理，把5月份传记的序言列为禁书。丕皮布洛奇向罗马申诉，但一直未获昭雪，直到1715年这位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去世一年之后，教皇克力门十一世才下令撤销原先的谴责。^②

波兰达斯派首批学者的继承人不能保持卓越的写作水平，但他们仍旧勤奋如故。对这项已经进行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工作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是1773年耶稣会被查禁；但当时波兰达斯派众神父尽管业已失掉自己原来强大组织的财力支持，却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地把工作坚持下去，直至1794年第53卷《圣徒行传》在冬格卢出版。这一卷包括了10月12至15日的圣徒传。接着出现了法国革命军队入侵比利时，在这次祸水之中，一切都被席卷一空。波兰达斯派搜集的文件和书籍很多都被毁坏。部分得救的则分散到荷兰和比利时各图书馆里去了。幸亏拿破仑一世还理解波兰达斯派进行的工作的价值，曾尽力使这项工作继续下去，但到1794年全部工作即中断，直到1837年，即43年之后，才又恢复起来。耶稣会这时已恢复；比利时政府还给了一笔津贴；旧资料也尽可能多地收集回来，于是这项工作又成功地重新开始了。

新丛书的第1卷于1846年前后出版。截至那时业已编成的全部著作，即61卷对开本也于1863—75年间在巴黎印刷了。这是各图书馆中仅见的巨著。后来还补上四卷，第4卷收进11月9至10日的圣徒传，全书大功告成可说业已在望，除了教会新封的

① 西班牙中部一个城市。——译者

② E·巴贝伦，“耶稣会教士和柏尼德提派之间的一次科学争论：古文书学的起源”，见《现代杂志》，第1期（1878年），第297—320页。

圣徒不在其中。^①

波兰达斯派学者鉴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中有些资料 and 文章虽不适于列入《圣徒行传》，但也有价值，于是他们就在 1882 年创办了一种季刊《波兰达斯文选》(Analecta Bollandiana)，专门出版这些东西。从 1891 年《波兰达斯文选》第 10 卷起，还附带刊印“圣徒传记出版公报”(Bulletin des publications hagiographiques)，认真列举并评述属于圣徒传记研究范围以内的、不论何地、何人写的各种文章。因此，人们借助于《波兰达斯文选》及所附“公报”，就可以完全了解圣徒传的进展情况了。对新近兴起、并已占重要地位的希腊文和斯拉夫文的研究说来，“文选”和所附“公报”特别显得重要。11 月份那卷的序言题为《拜占庭教会综述》(Synaxarium Ecclesiae Constantinopolitanae)，专门论述希腊和东方教会对圣徒传作者的研究工作的影响。在近代波兰达斯派的著作中，还有关于斯拉夫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暂时放下耶稣会波兰达斯派，来说说圣摩耳修道院的柏尼德提派。这个教派的学术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发展时期、衰落时期和卓越的学术恢复时期。第 1 个时期包括 8 至 13 世纪；¹⁴ 第 2 个时期从 1300 至 1600 年；第 3 个时期是 17, 18 两个世纪。

在欧洲大陆上，各寺院并未遭遇象英国寺院那样解体的命运，不过它们的情况当然也同样糟糕。^②但在 17 世纪最初 25 年中，新的寺院改革运动几乎在欧洲所有地区出现，在法国最为明显。德

① 《教会历史评论》，第 18 期(1922 年)，第 379—81 页；并参阅前边原书第 8 页的脚注中所列文献。

② “寺院的收入被挂名的住持在尘俗事务上挥霍了，又常常在放荡生活中挥霍了。这些住持不但不在修道院里居住，而且甚至常常对修道院根本不熟悉。……他们的兴趣是尽可能从自己的住持职位中多捞一把。……在法国这种弊端流行得极为广泛。就是特伦特宗教会议的高级修道士们也只好轻描淡写地谈到这点。”引自爱弥尔·夏万的一篇论文，“马比昂高僧和圣摩尔教团史”(巴黎，1843 年)，见 [伦敦]《都柏林评论》，第 21 期(1846 年)，第 218 页，全部论文见第 217—46 页。

国勃斯飞尔德的改革,西班牙瓦拉多利德的改革,意大利卡西诺山的改革以及法国费兰派修道士^①的改革等等,都是这种新精神的例证。这个运动在法国最为成功。

圣摩耳派,也像耶稣会那样,是反宗教改革的产物。它是在凡尔登^②圣凡尼修道院开始的,不久之后,便成为一支极其庞大的力量,以致在1614年召开的三方议会上,教士代表曾提议把这个教派的清规推广到全法国一切修道院。那时凡尔登已归属法国,虽然洛林公国仍属德意志帝国版图。但这个区别并不妨碍法国各修道院自愿采纳这项改革。不过,人们认为成立一个独立于洛林的“教团”要方便些,这个办法于1618年获得国王批准,1621年又获教皇格雷戈里五世批准。这个教团为向圣柏尼德提的得意门生圣摩耳表示敬意,即以他的姓命名。圣摩耳神父曾在墨洛温时代在卢瓦尔河上建立格兰费尔修道院,后改名卢瓦尔河上圣摩耳修道院。在巴黎及邻近地区,圣摩耳派有三座修道院,即布朗·芒脱、圣泽芒·得·布莱^③和圣登尼斯^④。到1720年,这个教团已有大小修道院180处,分别组成六个大主教辖区,统归一位终身职位总管管辖。但只有巴黎那一个集体的学术成就卓著。^⑤

① 1577年法国土鲁斯附近费兰寺院创立的昔妥教团(Cistercians)的一支。——译者

② 凡尔登是洛林公国的一个城市。——译者

③ 在巴黎城内。——译者

④ 在巴黎城外。——译者

⑤ 大多数属于圣摩耳派柏尼德提教徒的著作都和马比昂有关。下列为一般常见著作:高僧爱得芒·马太纳的《圣摩耳教团史》,夏万的新校订版(利居盖,1928—31年,五卷:见《法国修道院文库》,XXXI—XXXV);E·夏万的著作见上一个著者注;伊曼纽尔·得·布洛利里,《17世纪末(1664—1707年)的马比昂和圣泽芒修道院学会》(巴黎,1888年,两卷)[阿克顿爵士的评论,见《英国历史评论》,第3期(1888年),第585—92页;重印在他的《历史论文和研究集》(伦敦,1908年),第459—71页,他在这里写道:“传记家的和蔼可亲的弱点,似乎……在于赞扬这位修道士而不是赞扬这位学者。这部书的价值在于它包括了来自圣泽芒修道院档案的许多摘录”。还要参阅A·纪里在《中古时代》(1888年)一书中的说明,第161—71页];考斯道夫·兰孙,《人和书,伦理

圣摩耳派最初的宗旨是恢复柏尼德提派的学术，因为这一派的学术成就在中世纪曾是他们的光荣。这项努力是高僧塔里西开始的，他于1630年任总管。这项新的历史研究工作的资料来源就是该派在法国各地据有的大量文献收藏。这些“新”柏尼德提派成员并非仅仅好古而已。总的说来，他们都是历史学家，他们借助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和年代学等辅助学科，出版了许多新文献，并重新修订了许多旧著作。他们这个运动遭到特拉普派^①激烈反对，后者争辩说，寺院生活的全部职责只能是虔诚、沉思、祈祷和祭祀。他们是昔妥派修道士的一个近代分支，从来都不提倡高等教育或学术研究工作。高僧马比昂在他的《论修道院学术研究》(Tractatus de studiis monasticis)一书中对这种攻击进行了反击，他这部书精彩地说明了学术研究的价值。^②

仅仅在17世纪就可以在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学者团体中找出105位著名作家。第一位成名的修道士学者是高僧路克·达希

和文学研究》(巴黎,1895年),第25页以下(“17、18世纪修道士的博学”);亚丰瑟·丹提尔,《圣摩耳派柏尼德提教徒的未刊书简报道》(巴黎,1857年),包括达希里、马比昂、蒙福孔、雕兰德、德尔班、马太纳、马苏埃特和步瑟兰从1663年到1733年间的115封信;翁团·发利里编的《马比昂和蒙福孔关于意大利的未刊书札》(巴黎,1846年,三卷);关于此书的一篇评论,题目是,“法国的柏尼德提派”,见《爱丁堡评论》,第89期(1849年),第1—47页;A·伊丁哲的论文,“圣摩耳派的柏尼德提教徒和蒙特卡西诺的通信”,一篇从1671年到1737年的133封信的抄件刊登在《帕尼德提僧团史评论》,1913年1月至2月;爱德芒·马太纳,《圣摩耳派柏尼德提派两位教士航海记》(巴黎,1717—24年,两卷),一部在法国、德国、瑞士和低地诸国搜集资料的旅行的报告;Ph·但尼·得·拉洛克,“圣泽芒寺院的圣摩耳派柏尼德提教友”,见[巴黎]《历史问题评论》,第61期(1897年),第536—48页;约瑟·柏格坎普,《冉·马比昂高僧和圣摩耳柏尼德提历史学派》(华盛顿,1928年);詹姆士·史梯芬爵士,《宗教史传记文集》(伦敦,1850年,两卷),第1卷,第387—430页。

① 1660年法国诺曼底境内特拉普僧院创立的昔妥教团改革派的教徒们。——译者

② 这部著作最初是用法文写的,这一事实表明此书意在向大众申诉。后为约瑟·波塔译成拉丁文,并在威尼斯分三部分出版(1729年,1730年,1732年)。这部拉丁文译本广泛流行于意大利和德国。法文原版是一部稀有的著作,拉丁文本则不常见。

里(1609—85),人称“摩耳博学派之父”,他以《中世纪未刊文献集成》(Spicilegium)(巴黎,1655—67年)名垂千古,他这部书是从未出版过的中世纪原始文献汇编,计四开本13卷。他身体极其虚弱,以致在45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中他从未离开该修道院的附属医院。尽管如此,他仍然极其细心地进行编纂。在整理这部篇章浩繁的不朽巨著的靠后那些年里,达希里得到该教派一位名叫冉·马比昂的青年成员的帮助,这位青年人注定将成为摩耳派一颗巨星,而且可以说他必将成为17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冉·马比昂于1632年生于香槟省乡间一个农民家庭。^①在兰16
斯大学攻读六年之后,于1650年进入主教区神学院;1651年接受
削发仪式,1652年获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来进入兰斯改革派
摩耳教团所属圣雷米修道院。但因身体不好,不能长期在那里逗
留,后来就不得不转移到乡村气息更浓厚的圣摩耳修道院去了。
在早期的旅行经历和在古老修道院中进行的研究鼓舞下,他无疑
在思想感情上对研究旧时代发生了兴趣。后来,对他的历史著作
有一定影响的是:圣摩耳派,本国的学术生活,最后,在某种程度上
还有他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等等。

马比昂在圣雷米修道院时曾访问过以与法国诸王举行任圣职
仪式有关而闻名的一个老教堂,还曾访问过保存在高卢最早一批

^① 论述马比昂的文献很多。除上边原书第14页著者注中引的一些比较一般性的著作外,还可参阅佛特的书,第387—89页;马比昂的朋友高僧提埃里·鲁伊纳的短篇《高僧冉·马比昂生平简史》(巴黎,1709年);《马比昂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时出版的杂录和文献》(利居盖和巴黎,1908年;法兰西寺院档案第5集),附录许多著名学者的文章和H·斯泰因的一篇书目提要,第35—47页;《天主教百科全书》第9卷,第479—81页上那些论述马比昂的文章,以及《大百科全书》第22卷,第853页;桑兹的书,第2卷,第293—98页;罗森蒙的书(见本书原书第11页著者注),第1—21页;Ph·但尼斯,“马比昂高僧及其历史方法”,见《马比昂评论》,第6期(1910—11年),第1—64页;J·M·伯瑟高僧《路克·达希里高僧和马比昂高僧的通信集》,同上杂志,第8期(1912—13年),第311—25页;以及该杂志其他一些论文。柏格坎普的书(见本书原书第14页著者注)里边有一个长长的书目提要,第116—19页。

基督教徒遗骨的那些墓地。在他这段时期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上段所述第一种影响，即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些寺院的影响的迹象。1656年他被派往诺戎^①，在该地研究了修道院教堂那些墓碑，还曾一度“为了找到诺戎最有名的住持基伯特^②的坟墓，几乎把整个教堂的石铺地面都翻开了”。他曾在科比一段时期，利用那里那个完善的图书馆获益不浅，后于1663年调到圣登尼斯。这地方是法国教会的圣地，其中有法国诸王的坟墓，这个地方把他对基督教古代及其历史的兴趣充分激发起来了。马比昂在这段时间曾协助高僧克劳德·旃特龙编辑圣伯尔拿的著作，这项工作旃特龙死后由马比昂在圣泽芒修道院完成。

马比昂在圣泽芒时不但经常和法国的、而且还和全欧洲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接触，这对他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高僧布特勒^③在他那篇论马比昂的文章中曾引人入胜地记述了这些成就卓越的学者们的生活。他说，“巴黎其他宗教团体的一些成员和一些不属修道院的教士和俗人也分享他们的爱好和学问；星期日下午，这些有学问的人们当中就有一些去参加修道院的晚祷，然后退入一个房间休息，和这些修道士交换各式各样的消息和观点，其中包括教会的、中世纪学术的、古代文物和艺术等方面的。……这里常常看到杜·孔日、巴鲁兹、科特里尔、孟尼特里尔、勒诺多、夫勒里、提埃蒙、帕吉——只提提这几个人的名字就够了。”^④ 17

马比昂根据圣摩耳派精心制订的计划撰写的历史著作包括从圣柏尼德提到圣伯尔拿之间这好几百年，这几百年是“柏尼德提派

① 在巴黎东南。——译者

② 神学家和历史家(1053—1124)，著有《第一次十字军史》，参阅本书原书上卷第204页。——译者

③ 爱尔兰学者(1858—1934)，著有《西方神秘主义》等书。——译者

④ E·C·布特勒“马比昂”，见《当赛杂志》，第12期(1893年)，第116—32页，引文见第119—20页。

在基督教世界首屈一指的时代”。马比昂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历史科学作出了好几种不同类型的贡献；他的著作包括历史记述，古文书学方面的贡献，教会、教义和礼拜仪式等方面的研究以及考古学著作等。

马比昂的第一部著作《圣伯尔拿住持全集》于1667年问世，这是显露在历史研究上的颖悟和作为一位批评家的才华的著作。如前所述，这部著作在1664年圣登尼斯修道院高僧旃特龙死后便交给马比昂负责编写了。三年之后，这部书问世，并被公认为一部杰作。在这一版中，马比昂按照题材内容编排圣伯尔拿的著作，然后再按年代顺序分目。从这个版本中可以看出他处理从未校编过的原稿的技巧，而那些序言和评注也证明他熟知12世纪历史。

这部书出版后，马比昂就被调到圣泽芒·得·布莱修道院，校编柏尼德提派诸圣徒的《传记》，这些传记是达希里为编写一部柏尼德提派通史早已搜集起来的。搜集资料的工作仍继续进行。《圣柏尼德提派圣徒传》第1卷于1668年问世；其余八卷于其后直至1701年间陆续出版。其内容包括从圣柏尼德提时代至11世纪末。这部著作的准备工作虽说是集体功劳，但那些序言却都是马比昂亲手写的，显示出他在批判上和阐释上的真知灼见。在这些序言中，他对每一个世纪的主要事件都作了说明（每卷传记包括柏尼德提派历史上的一百年）；他列出了诸教皇和国王准确的年代表；讨论了有关寺院制度和教廷的许多有趣的问题；澄清了象女教皇佐安^①一类神话，并提醒人们注意宗教习惯方面的变化。他这些序言还以单行本出版（卢昂，1732年），这是一部四开本书，共600余页。马比昂的《柏尼德提圣徒传记》的设计和波兰达斯派的《圣徒行传》不同，后者是按每年圣徒的节日编排其生平的。而柏

^① 传说9世纪利奥四世之后有女教皇佐安，1640年布伦得尔始著书证明其妄。
——译者

尼德提派的《圣徒传》则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这个方法当然更适于历史研究。这个教派早期那些史学家认为圣徒约计 80 位，但 18 马比昂肯定其中只有 25 人属于柏尼德提派，不能再多。有人向教士总会提出抗议，马比昂曾被召去澄清他的历史方法。他用一篇出色的专题报告作答，说他很愿意根本就不写历史，但如果写的话，就必须写真实情况；历史关心的事和真正的教诲是同一回事。从此之后，在他自己那个教派以内，他就再也没有受到过指责了。不过，难以招架的批判还在等着他去对付呢。

为编写《柏尼德提教团年代记》所作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 50 年之久，马比昂和鲁伊纳二人在整整 9 年中拿出自己全部时间撰写这部书。1703 年第 1 卷问世，是一部约 600 页的对开本，在随后几年内又出了三卷。另外两卷的材料已准备妥当，在马比昂死后才出版，已出版的这些书把这个教派的历史叙述到 12 世纪中叶。马比昂的知识就到此时为止。经常参加圣泽芒修道院星期日午后聚会的一位学者朗格鲁修道院住持的话是对的，他说：“马比昂神父对 7 至 11 这几个世纪非常熟悉，但对其前其后则毫无所知。”

《圣柏尼德提会年代记》(Annales ordinis s.Benedicti) 完全是一部历史记述，是根据马比昂和他的友人在更远一些的旅途上逐步收集到的《圣徒行传》和其他文献写的。第 1 卷在准备工作完成将近十年之后才出版，介绍了柏尼德提派自从 5 世纪末成立至公元 700 年间发展的历史。第 2、3、4 卷出版于 1704 年至马比昂去世的 1707 年间。未完成的工作由几位同事和续编者继续进行。

在编写《圣柏尼德提圣徒行传》和《柏尼德提会年代记》两书之间的一段时间中，马比昂在为他那部最伟大的著作《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 1681) 准备材料。这部著作的来历前已提及。在序言中他告诉我们引起他写这部书的原因是：“这个题材不

但有用、而且新颖，再就是辩护也需要它。”接着他又解释说，“不仅教会史和世俗史，而特别是俗人和教士的情况都要依靠这类文献材料。”这也许表明他这个教派对其档案是很重视的。他给自己规定的目标是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既不是抛弃一切文献，也不是无区别地兼容并蓄，而是捍卫合法文献里的事实，并以确凿的材料

19 驳斥伪造文件的虚假。换句话说，他所进行的是一种积极的考证，他所做的正是本亥姆所说古文书学家应当做的，即证实资料的真实性和某些材料的虚伪性。在他以前，从来都还没人表明自己能够毫无争辩余地地证明某一早期文献是否真实；^① 这项建设性的工作就是马比昂的功劳。

马比昂把出自同一个国家的同时同地的大量文献拿来比较研究，用这个办法制定出判断资料真伪的法则和规范。他运用古文字学审查这些文献，从中得出自己的法则。为了取得判断这些文献真伪的标准，他利用的就是这些文献本身。但他在《古文书学》中陈述这些准则时却很少以具体事例说明他的论点。

《古文书学》前两卷说的是古文书的原则，用以确定特许状真伪的一些验证。在第1卷里，马比昂澄清并确定特许状的不同种类，然后证明教会和王室那些特许状是在很早时期就颁发了（王室特许状颁发于5世纪），因此，一张公文即使年代久远并不能成为可疑的原因。他考查了一般书写公文用的五种主要纸料；然后还谈到所用墨水以及书法种类。在第2卷里，他谈到公文上用的语言，指出文词芜杂（barbarity）^② 是文件古老的证据之一。在这里他是在运用由人文主义者编造并被发拉巧妙地加以运用的语言学考证这个批判武器。他详细讨论了能说明中世纪特许状特征的五个部分，还详谈了印鉴，特别是年代编排的种种方法。马比昂就是

^① 阿克顿，《历史论文集》（见本书原书第14页著者注），第461页。

^② 指杂用外国语言。——译者

这样用行之有效,准确无误的法则说明,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真实文件的正确形式是什么样子,^①并在两卷书中都提出古文书学的一般原则。

其他各卷为这些原则举出证据和实例以及运用这些原则的方式。第3卷讨论了丕皮布洛奇曾提出质疑或指为伪造的一些公文,特别是圣登尼斯修道院和柏尼德提派其他修道院档案中的那些文献。第4卷列举了法国诸王撰写公文的住所或“宫殿”;第5卷提供了古代手写稿一些实例;第6卷的内容是200多份原始公文的抄件。附有注释和论证,说明这些公文为什么是真的。

古文书学这门新科学就是这样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之上。的确,还有一些错误需要纠正,在方法和凭证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今天的要求;但马比昂奠定的基础是扎扎实实的,至今并未动摇。《古文书学》的那些批判原则仅仅涉及一个巨大领域的一部分,但它们还是很有成果的。

虽然作为耶稣会成员的波兰达斯派接受了马比昂的历史结论,但其他耶稣会学者,特别是阿杜因,却继续在墨洛温王朝那些公文的真实性问题上争论不休。^②人们会怀疑他们的动机并不完全是出于对批判须得准确、真理须得完整的热情追求。这是因为,假如在墨洛温时代颁发给柏尼德提派诸修道院的那些地契能够证明是伪造的话,那么耶稣会便可得到占有这些古老财产的好机会,特别是柏尼德提派那些修道院多半是极其古老的。马比昂那非凡的批判才能、再加上他那高尚的对学术的忠诚,就使他几乎经常和许多其他天主教学者发生冲突。詹生派^③和摩林纳派^④攻击他编

① 罗森蒙的书(见本书原书第11页著者注),第16—17页。

② 《法兰克王朝真实文书与古代文书真伪辨。政治科学博士冉·马比昂论》(巴黎,1703年)。

③ 康乃略·詹生(1585—1638)(荷兰神学家)所创的教派。——译者

④ 西班牙神学家路易·得·摩林纳(1535—1600)所创的教派。——译者